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缔造霸权

##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

王缉思 牛 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013032272

D871.20

102



# 缔造霸权

##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

王缉思 牛 军 主编



北航

C16395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D871.20

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王缉思,  
牛军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1268-1

I. ①缔… II. ①王… ②牛… III. ①冷战-美国对  
外政策-研究 ②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3143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缔造霸权**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

王缉思 牛军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9.5 插页 4 字数 544,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68-1/D·2229

定价 78.00 元

缔造霸权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缉思

副主编：袁 明 朱 锋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正毅 王缉思 牛 军 石 斌

叶自成 朱 锋 关贵海 范蔚文 罗伯特·罗斯

罗伯特·阿特 陈 昕 查道炯 袁 明

贾庆国 唐世平 梅 然 杰克·斯奈德

## 丛书总序

#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前 言

这部《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是我们执行并完成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研究成果。从2007年开始,来自国内几个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几位教授、专家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究。这期间曾经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07年11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缔造美国大战略:冷战的终结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著名大学的十几位从事冷战史和美国战略与对外政策研究的著名学者,同国内的项目参加者共聚一堂,研讨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这次会议的论文在会后结集出版。这些国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助于深化这个课题的研究。

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重要价值,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强调过很多次。对美国当今世界地位和对外战略的研究,离不开对冷战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研究。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冷战的胜利者。不是基于学术的兴趣,还是为了达到更好地设计中国的国家大战略的目的,都要首先认知这个事实的历史含义,然后回答一个基本问题:美国为什么能赢得美苏冷战?这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学者最初的问题,这个项目的论证逻辑是从回答这个问题展开的。

从本书所包括的研究成果看,答案是丰富多样的,并且极富启发意义。每个参与的学者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阐述了对美国大战略及其所涉及的各个主要方面的理解,包括它的形成过程和重要特征,同美国历史和战略文化的内在联系,它发展的国内动力和对美国国家建设的深刻影响,实施过程中在不同层面和领域的表现和后果,对世界政治的复杂和



长远的影响,以及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某些领域发展的影响,等等。为了能够更清楚和集中地阐述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主要观点,本书没有像传统的外交史著作那样,按照编年史的体例来叙述美国大战略史,而是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在一个保持内在逻辑联系的总结构下,尽可能深入地分别探讨一些更新鲜和更有意义的问题。综合看,本书的探讨部分是历史叙述性的,部分是理论性的,有的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若干问题。这些研究远不能说是全面的,但还是反映了一些年来这个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尤其是开拓了研究美国大战略的视野,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领域。

根据项目的设计、各次会议的讨论和学者们的研究情况,我们将对美国大战略的研究分成上、中、下三编。上编是“思想与制度”,主要是研究美国大战略的思想根源和制度影响,包括:《美国遏制战略思想的缘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著)、《理想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著)、《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建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可著),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郝雨凡著)等四章。

中编是“战略与政策”,主要研究在美国大战略规范之下的一些重要的战略问题,包括:《美国核战略的形成及演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著)、《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建才著)、《美国的同盟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著),以及《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超武著)。

下编是“决策”,重点研究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分析,包括:《冷战与美国危机管理决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著)、《美国的局部战争决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著),以及《冷战与美国军售政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著)。

本书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所著《国内变革:美国大战略及其赢得冷战的基础与动力》代序言。该文专门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和动力,并指出美国国内的持续变革与革新是美国赢得美苏冷战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这一研究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美国大战略的深层关切;另一方面,从研究体例的角度看,对此问

题的研究实际上构成了研究美国大战略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分作为本书的代序言,既是为了补充研究和认识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欲完整认识美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中胜出的历史原因,就必须对美国作远比现在更为完整的研究,尤其是全面深入研究美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政治制度、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方面。

从更宏大的历史观看,冷战虽然持续了40多年,终究也就是全球历史进程的一个短暂的过程,其中发生的很多事件既是过去的延续,也是今天的前提,而且很有可能决定或影响着未来的趋势。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也可以说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历史现象,美国的大战略则是“美国”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对美国大战略的研究实在不足以解释冷战40多年的美国及其世界地位的形成过程,这项研究只不过是分析了美国赢得美苏冷战的部分原因。而且这些研究也是从某个角度提示后来的人们,美国大战略的很多特点是历史性的,这决定了它是不可复制、无法效仿的。总之,对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研究,包括这个战略对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影响,以及对冷战进程和结局的影响等等,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本书包括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新的研究阶段开始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对那些有兴趣的读者和青年学生将是开卷有益的。

最后,再次衷心地感谢参加这个项目的各位教授和专家,是他们的学识、努力和贡献使本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并结出学术硕果。我们之间的交流、研究和相互推动并不会仅仅反映在形成文字的这些成果中,还会体现在我们的教学和未来的思考中,使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受益,使年轻的同学们受益。感谢刘远政同学,他在协助项目管理、组织学术会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感谢李亚男同学为本书的编辑校对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编 者

2012年5月22日

## 代序言

# 国内变革：美国大战略及其 赢得冷战的基础与动力

王缉思

本书从诸多方面深入论述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与大决策，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利用作序的机会，阐述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革的深刻影响，从这一角度可以揭示美国能够最终赢得美苏冷战的原因。

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苏联解体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是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sup>1</sup>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sup>2</sup>。

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寻找。只有国内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里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

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也使得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sup>3</sup>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 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sup>4</sup>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sup>5</sup>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

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第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与无神论共产主义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sup>6</sup>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还是极少

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美国政府《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sup>7</sup>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对美国人有着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解体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sup>8</sup>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说，东欧剧变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危机和最终解体。<sup>9</sup>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sup>10</sup>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

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Donald White)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sup>11</sup> 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sup>12</sup> 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期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的美国总统直至里根时代，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sup>13</sup>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

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sup>14</sup>

## 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

如果说杜鲁门时期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 E. 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在加纳去世。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Jimmy Wilson)，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sup>15</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人士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



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 1956 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 1957 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表示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度尼西亚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sup>16</sup> 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sup>17</sup>。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sup>18</sup> 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 1957 年和 1960 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 1957 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 101 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sup>19</sup> 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